



炎黃文化研究

第四輯

四大名出版社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 黄帝陵基金会 ● 炎帝陵基金会

主编 王俊义



炎黃文化研究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 黄帝陵基金会 • 炎帝陵基金会 主办

主编 王俊义

第四辑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炎黄文化研究. 第4辑/王俊义主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 7
ISBN 7 - 5347 - 4284 - 6

I . 炎... II . 王... III .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7637 号

责任编辑 吴韶明

责任校对 新红平 裴志远

封面设计 王翠云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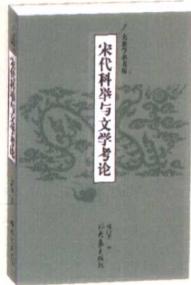
字 数 393 千字

定 价 33.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66202901



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

祝尚书 著

宋代是科举制度大变动的时代，也是历史上科举空前繁荣的时代，两宋科举在整个中国科举制史上有着特殊地位，但学界历来对之研究极少。本书作者从大量文献中钩稽梳理，全面探讨了宋代科举沿革变迁的来龙去脉，以及科举制度、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本书共收录了作者的论文22篇，傅璇琮先生在序言中高度评价说：“这部著作虽然看起来是论文集，实际上却是全面考论宋代科举的专著，并且将两宋科举制度的沿革与文学、理学、文化风尚、士人生活，甚至举子用书之刻印、发行等，做广泛而具体的探讨，这种细致的考索与极有新意的拓展，是近二十年来宋代科举与文学、文化交结研究所未有的。”

开 16 开 390 千字

定价：38 元 2006 年 3 月出版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张岂之 方克立 石兴邦 韩 伟 文选德
主 任 张文彬 孙天义 石玉珍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才 王俊义 冯广裕 曲英杰 刘宝才
李尚英 何炳武 邵小强 耿相新 黄爱平
梁绍辉 曹敬庄 曾雨农 漆永祥
主 编 王俊义
副 主 编 王 才 曾雨农 邵小强
编辑部主任 李尚英

卷首语

◇王俊义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帝陵基金会、炎帝陵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新一辑《炎黄文化研究》结稿付印，又要和读者见面了。

这份综合性的学术文化丛刊，从最初以《炎黄春秋》增刊的形式问世，到自主公开发行，再到由三家联合主办，每年两辑，定期出版，且将长期坚持下去。这种变化标志着炎黄文化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殊属可喜可贺！

《炎黄文化研究》为何要由一家独办改由三家合办，究其原因与丛刊的宗旨以及炎黄文化研究日益升温密不可分。弘扬中华人文始祖——炎黄二帝的功业，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团结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促进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是从刊创办以来始终倡导的宗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宗旨愈益成为海内外华人的共识，尤其是得到炎黄二帝遗址遗迹所在地以及致力于炎黄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支持。而今，由三家以弘扬研究炎黄文化为己任的单位联合办刊，可谓水到渠成，势之所然。

由一家独办改为三家合办，绝非只是在形式上由一加二。这种举措在实质上表明炎黄文化研究已从各自分散的研究进而形成合力，众志成城，各施所长，优势互补，定将团结合作，有步骤、有计划地深入开展研究，提升研究水平，提高研究质量。《炎黄文化研究》正是为此而营建的平台，她据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理应逐渐成为炎黄文化研究方面的核心阵地与权威性的丛刊。有鉴于此，三家主办单位的领导、丛刊的顾问与编委们，在新编委会成立的座谈会上都殷切期望要发挥联合优势，办一份一流的学术文化丛刊，使之成为有品牌效应的学术名刊。

如何把这种美好的愿望变成现实,我想还要靠大家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精诚团结,群策群力,玉汝于成。

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形势下,一份学术文化丛刊能否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她的内容和质量能否受读者欢迎,能否让读者从中受益。这就要求其刊发的文稿言之有物,内容充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且能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引领时代潮流,体现时代精神,研究和解决文化研究中的各种难点和热点问题。

特别是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学术文化刊物数以千计的竞争境遇中,一份刊物要争得立足点,要形成不可取代的地位,就必须有自身独具的特色,要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魄力和勇气。而《炎黄文化研究》是海内外仅有的以突出研究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学术文化丛刊,具有自身独到的优势和鲜明的特点;与此同时,由于广义上的中华炎黄文化亦即中华民族文化,这又使本刊兼具研究“大文化”的性能,与其他同类文化刊物有着相同之处。因此要“一方面下大力气办好人无我有的那些特色栏目”;而“对与其他文化研究刊物有共性的那些栏目,则朝着人有我优的方向努力”。我想编委同仁及所有关心、支持本刊的领导、专家和朋友,都有责任相互鞭策,共同勉励,朝着这样的目标努力奋进!

由于联合办刊的三家单位既有弘扬、研究炎黄文化的共同目标,又因工作职能之别各有特点,因此,刊物除保留原有重点栏目外,将新设有特色的相应栏目。这既是炎黄文化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也有利于理论与实际、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热望有关的学者、专家踊跃赐稿,并配以相应的图片,以增强刊物的可读性。

本辑《炎黄文化研究》是联合办刊后编辑出版的第一辑。编后既感面貌一新,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联合办刊的原则,发挥了优势互补的效应,同时也感到要真正办成一流的学术文化名刊,还有很长、很远的路要走。任重道远,尚需加倍努力!

目 录

专 论

- 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 许嘉璐\1

笔 谈

发挥联合优势 创办学术名刊

- 《炎黄文化研究》新编委会成立笔谈 \14
 同心协力,努力办成一流文化学术丛刊 张文彬\14
 进一步开展黄帝文化研究,扩大炎黄文化影响 孙天义\16
 “强强联合”,开创炎黄文化研究新局面 石玉珍\17
 《炎黄文化研究》应有相当的学术含量 张岂之\18
 发挥联合优势 创办学术名刊 方克立\19
 新阶段 新起点 黄爱平\21

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研究

- 论“炎黄文化研究”及有关问题 石兴邦\25
 关于炎帝陵的史籍记载 曾雨农 曹敬庄 唐理佳\35
 黄帝陵的历史与现状 何炳武 吴敏霞 秦开凤\46
 黄帝·炎黄时代·黄帝文化
 ——《黄帝陵志》读后 詹子庆\62

思潮与学派

- 姜太公及《六韬》的治国韬略 姜国柱\67
 晋至隋代的谶言 吕宗力\79
 南宋四明地区私学传授研究 陈晓兰\91
 全祖望与黄宗羲学术的传承和发展 黄爱平\107
 清王朝文化政策的转折
 ——同治时期文化政策初探 张 艳\120
 从历史上的民间教门与拜上帝会看中国的“新兴宗教” 秦宝琦\133

祭祀文化

- 黄帝祭祀与中华民族传统祭祀文化 刘宝才\143

目 甲申清明黃帝陵祭祀大典礼仪 韩伟 吴镇烽\152

录

服饰文化

明代官服文化 赵连赏\161

清宫服饰典制概述 丁琼 张莉\181

文化丛谈

“三事”之说与文化的五要素 李存山\194

论胡乐胡舞在初盛唐的传播 杨晓靄 王松涛\210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灵魂

——《西安宣言》的启示 张兵\221

中外文化交流

关于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几件事 向达遗稿\227

郑和下西洋与中外物产交流

——以马欢《瀛涯胜览》为中心的探析 万明\239

费正清与美国汉学的转变 赵晨诗\251

巴拉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 陈开科\258

中华学人

郑天挺教授与明清史学 常建华\271

缅怀尹达先生 曲英杰\284

文献整理与研究

佛教典籍的整理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李富华\294

师友交游与张穆著作的续补校刊 郭丽萍\303

书评与序跋

《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序 孙钦善\310

《古代社会文化探究》评介 冯广裕\314

学术动态

2005年“炎帝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霍彦儒\318

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

◇许嘉璐

引子

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在中国共产党 80 年的历史上，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为什么这样讲？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的：

1. 它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标志。中华民族有着全世界无与伦比的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根据文字记载，自周代起，历代统治者都有意识地提倡适合于当时当地、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文化。但是，提出“先进文化”和“前进方向”的概念，并且宣布执政党是其代表，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三个代表”是一个整体，三者之间密不可分，“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换言之，我们所要求的先进文化，是为人民的文化，就是人民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和历代统治者关注文化的本质区别。
2.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对文化十分重视，我们翻开中国共产党党史或《毛泽东选集》等文献，都可以看到这方面情况的记载。几十年来，文化工作一直是党的许多战线中的一条。现在，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定为建党和执政的三个支柱之一，这是把握住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是认识上和理论上的质的飞跃。
3.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再一次为“先进文化”作了界定：“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定义中，时代性、先进性、革命性得到完美的统一。十六大报告又指出：“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就指明了我国建设先进文化的基本道路和原则。这种对先进文化的深刻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上对文化及其方向的最科学的说明。这在文化学上也是里程碑式的理论突破。

专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文化问题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科学判断,是因为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是因为认真深入地分析了人类的历史和国际国内的形势,是对人类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空前的。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异质文化,以适应社会生活。首先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其次要适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应的人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在这方面,中华文化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我在“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这样一个题目下,简要介绍中华文化的伟大,剖析中华文化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同时探讨建设先进文化的一些具体问题。

一、定义

1. 文化

文化是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因为其复杂,也因为对它进行观察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有异,所以定义有多种多样。有人说世界上给文化下的定义有200多种,我没有作过统计,不知道是否确实,但意见有分歧是肯定的。

我认为这样给文化作界定是比较准确而且易于被人们接受的——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专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谈的就是狭义的文化。

文化是有层次的。人们容易感知也容易变化的是体现在物质上的文化,即蕴涵在衣食住行中的文化,可以称之为表层文化;介乎物质与精神之间、借助于物质来体现的文化,是中层文化,包括风俗习惯、制度礼仪、法律宗教等;文化的底层是贯穿和渗透在表层、中层中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即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概括起来,可以说文化就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无所不在;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

文化是民族性十分强烈的现象,是民族的标志和灵魂;是民族凝聚力量之所在,是创新力量的源泉,是民族的根。在现代社会,“民族”已经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血缘的概念(以血缘分是种族),从这个角度说,文化亡则民族亡。

2. 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是我国56个民族在几千年里共同创造的文化。56个民族自身的文化相对于中华文化是亚文化,其中,汉文化是主体文化、强势文化。在汉文化中不断融进了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个过程至今还在进行。换言之,如果没有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汉文化就没有今天的辉煌。

中华文化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出亚文化、次亚文化。例如,以行业分,可以分为商业文化、农村文化、学校文化、军队文化等等;以人们居住地点分,可

以分为城市社区文化、大中小学校园文化、营区文化、村镇文化；从加工粗细、涉及面广狭分，可以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因为这是差异不同的标准对同一事物进行划分，所以得出的各类亚文化之间彼此是交叉或重合的。

3. 先进文化

文化是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且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文化先进与否，关键要看它对经济基础起到的是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文化又是社会个体和整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先进与否，要看它对人和民族的发展是刺激和引导其向上还是催其向下。党中央给“先进文化”所下的定义就是结合中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从文化对社会、对人民的作用考虑的，是对毛泽东同志给先进文化下的定义的发展。在这个定义中，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即“人化”。“人是万物之灵”，灵就灵在人是文化的动物。有没有文化，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分水岭。因此，“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就要除了在物质方面关心人之外，还应该在文化上关心人。文化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这样，在一个时期内，人们的衣食住行问题是首要的；但从长远来看，对人的关怀的最根本的东西是文化，是精神，也就是“终极关怀”。因为人的衣食住行只是生存的条件，而不是生存的目的，在物质条件基本得到满足后，人就要追求某种精神：文化是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党和国家对文化问题的重视，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二、中华文化的特点及其形成

1. 中华文化的特点

中华文化基本上是农耕文化。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区别决定了农耕文化的特点：

重家族，重继承——因而轻平等，轻权利；

重安定，重和谐——因而少变革，反争斗；

重自然，重现实——因而反造作，轻来世；

重伦理，重自律——因而乏个性，轻法律。

上述的优点只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在这基础之上就引申出爱国（国与家不可分，家是缩小了的国，国是放大了的家）、团结、务实、讲道德。

如果与游牧经济和工业经济相对照，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农耕文化的这些特点是由农业生产所决定的。

游牧生产要逐水草而居，安定反而不利于其生产生活；大自然之于牲畜的繁殖不像对于农作物生长影响那么大，因而人们对自然现象与人的关系关注较少；为了牲畜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孩子长到一定年龄就要另立门户，且放牧的技术知识不像农耕那样复杂，无须代代相传，因此家庭观念、继承观念较为淡薄，国家的

观念也不强烈；牲畜能够给人类提供的生活资料很有限，如果要获得别的生活资料就要靠贸易或掠夺；游牧的流动性，不需要也难以建立名目繁多、界限严格的等级制度，在人们心目中除了“神”之外，人都是一样的。这样，从游牧生产而生成的文化就和农耕文化有了很大区别。

工业化给人类社会和文化带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冲击。人们离开故乡，传统家庭解体；进入工厂，与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一起组成了新的群体，组织能力得到提高；操作机器的技能不是靠父子相传，而是靠学校或工厂的训练；工厂的一切都不是工人所有，工作岗位不能继承；工业生产基本上与季节和气候无关，机器的节奏和速度要求工人组织严密、遵守严密的规则；产品和劳动力过剩，造成工人生计的不稳定；科技产生了工业，工业促进了科技，要求人们不断求得新知新能；科技的发展要求对任何事物都作越来越细的分析，还要进行抽象的逻辑思考；工业生产的商品要销售，特别是要到本土以外销售，需要有强有力的保护，于是增强了国家意识（在工业化发源地欧洲，这是由少数有产者的需求形成的意识，比较容易改变，所以当经济出现全球化趋势后，新形势下的少数人又带头淡化国家意识）。这样，由工业生产而生成的文化也与农耕文化很不相同。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农耕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最为密切，观察最为细致入微；人与人的关系最为亲密，对人际关系总结归纳得也最为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这一阶段的文化中具有普世性的内容也最多。

2. 中华文化形成的过程

现在考古的成果证明，中华文化有多个源头，不仅从地域上说是多元的，从民族角度说也是多元的，而不是过去人们所说的只是黄河流域的一个源头。从理论上讲，这个结论也是对的。人类的历史证明，从氏族到部落，从部落到部族，从部族到民族，都是通过战争掠夺兼并和通婚联盟两个渠道把不同部落、部族和民族融会为一。不同血缘、不同文化的汇合，使人的体格更为健壮，文化也不断丰富。由此可以断言，中华民族有着多元的源头，是自古至今所有民族共同创造的。

但是，现在的文献和考古也证明，黄河流域的文化自商代起，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这是因为，黄河流域最先进入农耕社会，耕作技术最为发达，知识积累最为丰厚，农业生产使人第一次有了生活资料的节余，因而文化得以精细化。人类总是向着生产生活水平高的地区和人群靠拢。黄河流域文化的先进状况吸引着周围的部落和部族，于是继续演出着通过战争和婚姻与黄河流域的其他部族乃至远方的部族融合的戏剧。

这是文化的竞争。在这个战场上也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黄河流域文化吸纳了众多部族（和后来的民族）的文化，终于形成了世界少有的几个伟大文明之一，而当时的其他一些文化则以融会于主流的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中华文化形成的进程中，大体是由今甘陕一带（以今两省交界处为主）逐

渐向东发展。殷商在今河南北部建都，后来周又在西边兴起。此后，历经秦、汉，都在今陕西建国。至于后来最为富庶的长江三角洲，虽然也有原始文化产生，但并没有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这是因为，江南水多，西北土多，而原始的农耕生产水平能够克服偶尔缺水或多水的灾难，却无力战胜长年水多、瘴疠遍地的困难。长江三角洲是后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慢慢开发出来的。

3. 中华文化传承的特点

(1) 始终带着农耕社会的特点。中华文化中的几个重要支点儒、道、法、墨、农等家学说，都不过是从不同角度对逐渐发展起来的农业社会和所了解的大自然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态度。到汉代思想归于一统，儒家成为皇家唯一的正宗学说，到宋代儒家学说又有了新的发展，也都没有脱离农耕社会的特点。

(2) 在中华文化传承过程中承担着继承、传播和发展重任的主要两个系统：官府和学校。官府，一方面运用科举考试指挥着全国学子的学习，从颁布规范课本到对经典进行再阐释；另一方面由官府举办从县到中央的学校。学校，既有官学也有私人办的书塾、学院。官府和学校在一般情况下又是相互沟通、相辅相成的：官员可以是学校以前的或以后的教师；学生无论是在哪里学习的，将来都可能进入官府。一般来说，官府只是传播文化，而学校，特别是书院，常常成为深入研究并发展文化的所在。家庭，虽然也是文化传承的场所，但不是主要的，只是在系统传承之外起到熏陶、监督的填空作用。

(3) 国都总是文化的中心。这是由国都是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决定了的。由国都影响到全国各地的小的政治中心，同时由大小中心向农村地区辐射。这样，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中华大地成为一个巨大而周密的文化网络。每个人、每个家庭都生活在这个网络之中。

三、中华文化吸收异质文化的经验

1. 春秋战国时代（前 770—前 221）

这一时期，虽然有周王朝作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行政和军事的统一。周王给子孙、功臣和殷王朝的后裔封土建国，周天子（始祖的嫡传宗子）靠神权起着盟主的作用。等到过了几代，亲情逐渐淡漠，诸侯国力强弱不一，于是诸侯们不再把天子放在眼里，相互兼并起来。兼并的结果是出了几位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周天子后来只是一块任何人只要有实力就可以利用的牌子。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即指当时诸侯间的争斗既不是为维护统一的政权而战，也不是为“义”而战、为民而战。

周王朝这种名义上统一、实际并不统一的状况，对于老百姓是无穷的灾难，但是对于文化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个良好的环境。政治军事既然没有实质上的统一，各诸侯国的学术和习俗也就各走各的路。这从《诗经》、《左传》、《国语》等

书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春秋时代可以说是个准备阶段。到了战国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就充分显示了出来，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百家争鸣”时期。

周朝继承了殷朝及其以前的多元文化，由此而派生出的各诸侯国又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这些同中有别的文化之间的接触、冲突促进了各方的成长和提高。现在可以考见，战国时代学术、军事、语言都有很大进步，从出土文物看，工艺也比春秋时代发达得多。

2. 汉代(前206—220)

汉代在文化上存在着很大的自我矛盾。在学术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表层文化和中层文化的艺术等领域却又大量吸收来自周边其他部族或民族的营养，特别是西域的文化，更是学来了不少。思想统一于儒家，是因为经过了战国时代的分裂混乱，秦的时间太短，到汉才实现真正的统一，要巩固皇朝、维护国家统一，就需要思想的一致。把儒学抬高到近乎神学的地位，把自战国传承下来的其他与之不相合的思想放到次要的地位，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在文化的其他层次大量吸收异质文化，是因为疆土既开，必然和其管辖范围之外的文化相遇；汉代是一个气魄和胸怀都较大的皇朝，特别是汉初的几个皇帝，思想比较开放；而不同的文化接触，首先只是表层以及中层中的一部分，这些都无碍于皇朝的政治军事统治。因此朝廷对这些外来文化无须抵御拒绝。同时，汉的周围都是游牧文化，其文化总体上都不及汉文化深刻、完整、细腻，可以从中吸取的东西不多，特别是文化的底层，更不可能为异质文化所动摇。所以可以说，汉代吸收异质文化的特点是基本上停留在表层和艺术等范围内，没有触及文化的底层。

3. 唐代(618—907)

唐代是个伟大的时代，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强大的皇朝。就文化而言，也是气魄最大、襟怀最宽、成就最高的时代。唐代几乎在农耕社会应有的一切方面都达到了能够达到的极限。据西方学者估计，当时唐朝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占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三。就现在学者们的研究看，唐朝也是当时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

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例如在经历了南北朝的动荡后，人们经过了反思，吸收了北方民族和印度的文化，隋朝在多方面为唐做好了准备，等等。就其内部原因看，国家再次统一、国力迅速强大、高度发展的教育（与当时世界各国相比是最发达的）、皇朝抱负远大等，都起了相当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不必去探讨唐代兴盛的全部原因，但至少在文化方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敢于对所接触的所有民族的文化兼容并蓄，从中吸收人家的一切长处，这反映了唐代在思想上很少有禁区。一个民族在文化上勇于接受新事物，能够创新，在其他领域，例如生产、军事和官僚制度等，也不可能保守的。唐代不但和西域诸国往来频繁，而且和高丽、日本等东方国家关系也很密切。外国商人可以在首都定居，有才能的人还可以在朝廷做官、任职内廷，甚至带兵打仗。就

艺术而言，在唐代精美的绘画、音乐、雕塑、建筑、书法等作品中都有异族文化的营养；几乎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曾来到中国，并且传教相当自由。总之，在唐代，凡是好的东西，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全都欢迎，为我所择，由我使用，化为已有。

说到这里，我想举唐代佛教的例子，来说明在国力强盛时，中华文化是怎样接纳异质文化，并促进了自己的提高和发展的。

佛教据说自汉末就已传入中国，历代佛家一直在探寻佛教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道路，但是总是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传播受到很大局限。即使像唐高宗和武则天时甚至出现过狂热，但是也仅限于京都附近，而且大部分善男信女是把佛教当成方术——至今所谓“有灵异”的人和传说还是能引起同样的狂热——始终没能形成普通人们对佛教教义的信仰。寻究其原因，就佛教方面说，是因为其教义和中华文化重家庭、尊祖宗、为现世、讲伦理等基本内容直接冲突；从中华文化方面说，是因为儒家学说内涵丰富，据以排佛，力量、理据充分，而且反对提倡佛教的人都在知识界上层，有的还是朝廷大臣。

就在佛教与儒学处于胶着状态时，在远离佛教中心长安和洛阳的今之广东，出了一位伟大的和尚慧能（638—713）。他在前辈佛祖大德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佛性即人性，众生是佛，佛在心中，顿悟成佛，识心见性，无修之修，在家亦修等理论，把儒家的伦理，道家的“有”、“无”和佛教的心、性、佛合而为一。这样，慧能及其传人彻底结束了佛、儒、道三家的长期争论，把三者的对立变成了三者的相互融合。从这时起，中国的佛教“儒化”了，进而影响了儒家逐渐吸收自己所缺乏的佛教中的东西（例如对世界本源的思考），也近乎“禅化”了。——佛教的中国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

4. 近代（1840— ）

唐之后是五代，以后还有宋、元、明、清，但我现在一下子就跳到了清末。这是因为，虽然唐以下各朝也都在吸收异质文化，但是由于中国开始步入封建社会的后期，统治者趋向于保守，兼之或因国力不济，或气度不够，和汉、唐比起来差不多了。我在这里不是讲中华文化史，这几朝姑且略去不论。

1840 年前，简言之，特别是自明朝中期起，几乎完全拒绝或阻挡了外来文化进入中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海禁”。中华文化，其底层——基于农耕经济的儒家思想已经停滞，又没有新的刺激和新的营养，愈益萎缩，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如果只靠内在动力发展，这种动力就会渐渐减弱。文化衰微，国家必然日益衰败。用《红楼梦》里的话说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外面看着轰轰烈烈，可是内囊已经尽上来了”。1840 年，洋枪洋炮打破了中国自我封闭的墙壁，也打破了中国人妄自尊大的迷梦。

清皇朝兵败如山倒，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一个没有很深的文化底蕴的国家或民族，国家也就从此沉沦下去了，至少要几百年才能苏醒；而在中国这样一个

国家观念十分强烈的国家里，“国破”之恨正是治疗民族文化痼疾的一服猛药。在帝国主义枪炮前卑躬屈膝者是腐朽的统治者，大批志士仁人则前仆后继，探索救国之路。

到哪里去找救国之路呢？既然巍巍中华竟然被西边来的“夷”人打败，他们就一定有着了不起的法宝，于是人们眼睛一齐转向西方。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概括地叙述过这时中国寻找异质文化的过程：

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异质文化、西方文化。中华民族对它也和对一切异质文化一样，要经过引进、消化、吸收，最后化为自己的新的文化。

从 20 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经过前仆后继的奋斗牺牲，到 28 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经过 17 年的建设和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最后是改革开放，这百年的历史是大家所熟悉的。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从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人引进马克思主义到形成毛泽东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最后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中华文化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是中华文化成功地与异质文化接触、吸收和化为己有的胜利。这既是中华文化几千年经验的继承，又是在农耕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化，从少数人文化占统治地位向广大人民文化转化的伟大实验。这种接触与吸收已经不是被动的、自发的，而是主动的、自觉的。我们又在新的历史阶段创造了新的经验。这一经验为一切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都是解决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理论和思想，属于文化的中层（政治、宗教、制度、法律等）和底层（哲学，包括世界观、伦理观、认识论、方法论）。而文化还有表层，中层中还有风俗礼仪等问题，这是政治理论不能全部解决的。

前面说过，一种文化接受另一种文化，往往从表层以及中层的一部分开始，这些也最容易引起变化。清末的洋务运动、派遣留学生，以及辛亥革命前后在一部分人中的吃洋餐、穿洋服、拜洋教等现象（例如老舍先生的《茶馆》中的小刘麻